

# 秋瑾 1905 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

易惠莉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秋瑾于 1905 年 3 月从日本归国, 又于 7 月再赴日重新就读东京实践女学校师范速成科。她归国是为筹集留学经费, 然而很不顺利, 费用严重不足, 致使内心非常痛苦焦虑。秋瑾在东京读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 频繁参与各种留学生活动, 结交各色人物, 其行为又与学校管理规定严重抵触, 给她造成了困惑。在该年 11 月发生的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运动中, 秋瑾坚决站在罢课归国派一边, 是此次运动激烈派的代表人物。12 月末, 秋瑾退学归国。

关键词: 秋瑾; 留学; 日本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4)01-0114-09

以往关于秋瑾的研究, 一般都笼统地提及秋瑾于 1904 年夏天, 随同归国休假的京师大学堂教习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夫人繁子, 同船赴东京, 留学于日本帝国妇人协会所办、下田歌子为校长的东京实践女学校, 然后于 1905 年 12 月, 在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运动中退学而归国, 给读者的感觉是秋瑾在东京实践女学校留学一年多时间。而事实上, 秋瑾随同服部繁子于 1904 年 7 月 3 日抵东京后, 8 月中入读实践女学校为非正式注册生, 但 11 月就从学校自动退学。1905 年 3 月下旬秋瑾从日本归国, 7 月 23 日再次东渡抵东京, 8 月 5 日去实践女学校正式注册报道, 该校“清国留学生部分教场日志”记: “明治三十八年八月五日, 本日学生秋瑾入校。”<sup>[1]</sup>(P. 106) 所以, 秋瑾两次入读实践女学校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七个多月时间。学习女子师范

教育, 将来成为女学的教师, 这是秋瑾对外公开表明的东渡日本留学之理由, 而她在内心深处对留学的期待即其留学的真正目的, 要比公开表明的复杂许多, 而所期待的目标更高更远。<sup>①</sup>尽管如此, 秋瑾还是两次从东京实践女学校退学。尤其是她第二次入读实践女学校, 校方给她的是一次破格的待遇, 但她最终在入读四个月后, 仍然被校方“饬令退学”。关于秋瑾 1904 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的原因, 笔者前已有专文讨论<sup>[2]</sup>, 而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讨论秋瑾 1905 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sup>②</sup>探讨这个问题, 可以对秋瑾短暂的留学生的全部经历有更全面和真实的了解, 亦可以加深对她退学后不到两年就以烈士的方式结束年轻生命原因的了解。

收稿日期: 2011-07-12

作者简介: 易惠莉(1953-), 女, 四川乐山人, 历史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

①关于秋瑾留学日本的真正目的, 请参见拙作《秋瑾首次东渡日本留学原因再探析》, 《思想与文化》(第十一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版。

②关于秋瑾 1905 年 12 月从实践女学校退学之事, 已往一般研究秋瑾之论著者均会提及, 但其退学之具体原因, 除因其提议实践女学校中国留学生参与反对取缔规则罢课, 而被学校“饬令退学”外, 其他则均未论及。

## 一 秋瑾决定再度入读实践女学校 之原因及归国筹学费

陶成章《浙案纪略》之“秋瑾传”忆：“（1905年）日语讲习会终，瑾将还里省亲，因叩成章所运动事，成章尽以其所历告知，瑾乃索为介绍。”<sup>[3]（P.61）</sup>就在陶成章尚在东京活动之时，秋瑾于1905年春有归国之行。秋瑾从东京甫抵上海写给在北京的兄长誉章的信称“因师范尚未开班，大约四月开学，暑假不放，故于近日归家一行”。<sup>③</sup>函中“四月”，是指阴历。秋瑾说师范“大约四月开学”，而说“下月开学”，因此可以判定此时尚在阴历二月内，即公历4月4日之前。又因为宋教仁于3月23日还在东京的秋瑾寓所访问，那么秋瑾归国日期当在3月23日（阴历二月十八日）之后。<sup>[4]（P.48）</sup>关于秋瑾此时归国之事，服部繁子亦回忆：“（在北京）接到秋瑾从上海发来的一封信说，已从东京到了上海，根据情况或许再去日本。”<sup>[5]（P.49）</sup>

从秋瑾致兄信内容得知，秋瑾将入“师范”继续求学，因为师范尚未开学，故有归国之行。秋瑾信中所谓“师范”指的是实践女学校即将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一年制“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它包括“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两种。关于这个“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是起于1904年11月实践女学校收到中国湖南政府请求接受20名官费女留学生的申请，之后学校开始进行为接受这些湖南学生的准备工作。学校决定设立专门的“清国留学生部”，不但接收湖南的20名官费留学生，也接收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自费留学生，它在东京赤坂桧町设置分校——“分教场”，安置“清国留学生部”。这些工作都是在1905年上半年进行的。<sup>[1]（P.102）</sup>上海有杂志亦发文称“日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在东京创设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凡中国女子留学该科者……一年毕业……各科教授……由日本教师讲演，而请我国通人翻译”，“全年学费36元，入学金2元，伙食费120元，住宿费24元，包括校服在内一年的全部费用为215元5角。”<sup>④</sup>此处所谓“入学金2元”有误，“2元”仅是一个月的入学金，全年的入学金应为24元。所以，全年的全部费用应为250元左右。<sup>⑤</sup>

湖南要向实践女学校一次就派出20名官费留学生的信息，既显示出中国一些省份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又说明实践女学校在女性教育方面的

名声很好。而且，实践女学校明确要为这些湖南女性开办的是一年制的师范、工艺速成科。这些似重新唤起了秋瑾要继续入读实践女学校的愿望，因为进入女子师范留学始终是秋瑾的期待。<sup>[2]</sup>据学校教谕和舍监坂寄美都子回忆，实践女学校是不允许退学后再入学的，但她经与校长下田歌子商谈后同意秋瑾再入读。此次秋瑾选择的是一年制的“师范速成科”。<sup>[6]（PP.12-13）</sup>

秋瑾1905年春归国，是“为筹学费计”。<sup>[3]（P.61）</sup>当时留学日本的官费生，政府一年提供官费如湖南、湖北等省是400元。因此，若得一官费生资格，在日本之全年费用将比较充裕。秋瑾归国筹学费，也在“欲运动一官费”。<sup>[7]（P.34）</sup>

由东京返抵上海后，秋瑾先去爱国女学校访问蔡元培，又向《女子世界》投刊《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其中谓“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生……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我诸姐妹如有此志，非游学日本不可；如愿来妹处，俱可照拂一切……”<sup>⑥</sup>以后秋瑾再去南京，据陶成章谓是“欲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汉”。<sup>[3]（P.61）</sup>又据周作人4月20日（三月十六）日记，他在南京见到秋瑾。所记“十六日，封燮臣君函招，下午同朱浩如君至大功坊辛卓之君处，见沈翀、顾琪、孙铭及留日女生秋琼卿女士……”<sup>⑦</sup>

陶成章谓“资本家辛某之子汉”，即辛汉，字卓之，乃周作人日记中“辛卓之”。推测极有可能秋瑾南京之行所谓运动辛汉，是想通过辛汉谋一江苏官费生资格。秋瑾了解当时官费生的情况，她曾在致兄誉章函中告知“官费不一定须浙中者，各处俱可谋得也。”<sup>[7]（P.41）</sup>不过，秋瑾在南京运动辛汉为其谋江苏官费生资格无成，乃返回故

③《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3页。因函内有“草草解装”之语，可知秋瑾由东京甫抵上海。

④引文分别见《女子世界》第一年第12期，第二年第1期，1905年4月、5月发行。

⑤另据1905年7月发行的《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六号载《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规则》称，全年全部费用为250元左右。

⑥登载于6月间发刊的《女子世界》，载《秋瑾集》第32页。

⑦《周作人文选》，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又见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载《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6页。封燮三，字燮臣，浙江绍兴人，江南陆师学堂管轮专业学生。辛汉，江苏人，20世纪初留学日本，曾入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03年在日参与拒俄运动，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并与严修之子严智崇在东京发刊《白话报》，创办演说会。

乡绍兴探见母亲,亦有在绍兴谋官费生资格之筹划。5月27日秋瑾在绍兴致函誉章谓“大约月底动身赴东,近因欲运动一官费及绍中多去几女学生留学……恐难达望。”[7](P.33)秋瑾明白在绍兴谋官费留学名额成功的希望不大,开始多方自筹学费。她在致兄同函内又说:

妹于陶杏南夫人处……有龙头翠  
[翡]翠镯一只、珠子及衣服,如彼未售,  
已嘱交吾哥,玉镯在上海估玉器,已出  
价二百四十元,大约三四百元。如有售  
处,祈吾哥随机售出。[7](P.34)

所谓“陶杏南夫人”,即秋瑾在北京居住期间熟交的绍兴同乡陶大均之如夫人陶荻子。<sup>⑧</sup>此函表明秋瑾东渡留日之前,将北京家中的首饰、衣物寄存陶荻子处托其售卖,现在她又委托在北京的誉章为其索回和售卖。

6月19日秋瑾仍然滞留在绍兴,此日她第二次寄函誉章,开始向誉章痛骂丈夫王廷钧。[7](PP.34-35)这是在秋瑾所有留存文字中首次见到她痛骂丈夫的内容。从函内容可知,秋瑾痛骂丈夫的原因,似在丈夫未将其留在湘潭夫家的“珠帽及珠花”和誉章误寄到湘潭王家的银元一百交还给秋瑾二妹秋瑾,当时秋瑾出嫁的夫家亦住居湖南。为首饰“珠帽及珠花”和银元一百事,秋瑾甚至用了异常激烈的言辞责骂丈夫,可见秋瑾在谋江苏和浙江官费留学名额不得之后心绪的恶劣,以及为筹留学费用而生出的焦躁和烦恼。<sup>⑨</sup>秋瑾再次东渡留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一笔可靠的费用,而全部的留学费用,要依靠零星出售首饰和衣物筹措。故秋瑾此次留学关于经费的状况,比前一年更加匮乏和糟糕。<sup>⑩</sup>据陶成章谓,最终秋瑾是在绍兴“求给于母。母固深爱其女,然家徒拥虚名,实不中资,为勉强数百金付之”[3](P.61)。

秋瑾于6月19日函最后告知誉章“运动女生不能得手,日校又复来催促,故定月底动身也。”[7](P.36)所谓“运动女生”之事,即秋瑾在绍兴期间曾印发《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呼吁浙江女性留学日本,其中谓:

秋瑾不屑牺牲个人之学业,于前月  
顷,回国为我亲爱姊妹奔走呼号  
也……我之奔走呼号于最亲爱之姊妹  
者,仅属之于笔墨之间接力,或诸姊妹  
量其苦衷,有表同情者,无论自费,或须

筹费,请各抒高见,商榷办法,通函于绍  
城万安桥下明道女学堂。[7](P.9)

以上启事和秋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的内容,以及秋瑾致誉章函内所谓“运动女生不能得手,日校又复来催促”一语,说明秋瑾此时归国一行事前与实践女学校有约,为其在中国国内招生进行鼓动宣传。这应该成为学校破格允许已经退学的秋瑾再入读的原因。另外,秋瑾在前启事的一开始说“顷者留日诸君组织速成师范女学校……意自后我国姊妹苦经费之艰难、时间之短促、有志未逮者,咸得束轻便之行装……络绎东渡,预备修业。”这里秋瑾将“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说成为中国留日人士所办,说明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开办之由来,秋瑾一开始就知晓。因为湖南向实践女学校提出20名官费女生入读的申请,以及该校决定开办“清国留学生部”之事,当时的驻日公使杨枢,已经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范源濂,以及当时留日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杨度等人,一开始就都进行了筹划和参与。故秋瑾此处说学校是由“留日诸君组织”,意在鼓动宣传更多女性东渡入读。

秋瑾滞留绍兴期间,去见了徐锡麟,由徐介绍加入了光复会。6月28日秋瑾动身离开绍兴来沪,在沪上停留半月,适逢陶成章由日返上海,她又由陶成章介绍结识了浙江反清会党人士丁懋、吕雄祥等人。<sup>⑪</sup>7月17日秋瑾乘船再东渡日本,7月23日抵东京。[7](P.37)为节省旅费,抑或是船期的原因,秋瑾再次东渡乘坐的是三等舱,旅途很艰难,“长途触暑,一病几不起”。<sup>⑫</sup>因此,秋瑾再次入读实践女学校,已经是抵东京十几天

<sup>⑧</sup>关于陶大均和陶荻子,请参见拙作《秋瑾首次东渡日本留学原因再探析》相关内容。

<sup>⑨</sup>关于秋瑾在致兄函内责骂丈夫王廷钧的原因,更详细的分析,请参见拙作《二十世纪初中下层官宦子弟的生态——秋瑾致兄誉章十一函之解读》相关内容,《史林》2011年第6期。

<sup>⑩</sup>关于1904年秋瑾东渡留学筹措学费的情况,请参见拙作《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sup>⑪</sup>《浙案纪略》,收《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1页。陶成章谓秋瑾在绍兴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是为乙巳六月间(公历7月)事”。陶成章此处时间稍有误。因为据秋瑾抵东京后寄兄第一函内称,她于公历6月28日已动身离开绍兴。见《秋瑾集》第37页。

<sup>⑫</sup>后来她归国后曾在沪向吴芝瑛“述其留学艰苦状”。见吴芝瑛《纪秋女士遗事》,《秋瑾研究资料》第71-72页。陶成章也说秋瑾抵东京后“罹疾数月”。《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61页。

之后了。8月5日，她去学校正式注册报到。

抵东京后秋瑾罹患重病，一方面是旅途的艰难，再一方面可能是未筹得官费生名额，而由母亲所勉强学费不多，因此心绪很恶劣。关于后者，可见秋瑾抵东京后于8月14日致誉章函内容。函中，秋瑾继续追问银元一百二妹秋瑾是否已经从王家讨回，并再度痛骂丈夫，又开始痛悔自己的婚姻。[7] (P. 36) 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银元一百尚未讨回。于此再可见秋瑾筹留学费用的心情，及其留学费用之严重不足。这对于秋瑾而言，是逼她随时中止留学的杀手锏。

## 二 秋瑾在东京参与同盟会及留学生的多种活动

秋瑾在实践女学校的学习生活并不平静，因为在东京留学生的各种反清活动在召唤她。1905年7月19日，当秋瑾还在赴日船上之际，在东京她熟悉而关系良好的年轻朋友宋教仁和程家桎应孙中山之日本友人宫崎滔天之约赴其宅访问，宫崎滔天向他们介绍了孙中山其人及其事业。7月28日，孙中山由宫崎滔天陪同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访问宋教仁等人，双方纵谈反清革命之事。7月30日，孙中山、宋教仁等人正是在秋瑾就读的实践女学校清国留学生部所在的区域东京赤坂桧町，举行了同盟会的筹备会。8月13日，由宋教仁主持，留学生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发布章程，讨论决定《二十世纪之支那》成为同盟会之机关报。[4] (PP. 86 - 90) 所有上述活动，宋教仁均为主要分子，不过在其日记中未再见到关于秋瑾的记录。<sup>⑩</sup>

正式入读实践女学校的最初一个月，秋瑾似少有外出参与留学生活动。原因应该一是患病的身体尚未复原，二是入读一开始，尚须严格遵守学校严厉的外出活动规定。情况约在一个月后发生变化。据在东京另一位与秋瑾关系良好的湖南留学生王时泽回忆，在同盟会成立半月后，秋瑾是“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的。她加入同盟会后，被推为浙省主盟人。后来浙江志士入会者，多为她所介绍”。[8] (P. 201) 冯自由本人亦说“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半月，冯自由介绍瑾致黄克强宅入党。浙人入同盟会者，蒋尊簋为最早，瑾其第二人也。”[9] (P. 165) 王时泽和冯自由都是亲历同盟会筹组和成立的当

事者，他们所述秋瑾加入同盟会之时间应该无误。同盟会正式成立于8月20日，半月后乃9月5日左右，即秋瑾第二次入读实践女学校一个月之后。自秋瑾参加同盟会后，有关她参与留学生活动的记载就多起来。如刘揆一称：同盟会成立后，黄兴“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秋瑾与陈撷芬等女留学生“皆加入练习”。刘揆一又称，当黄兴创学习炸弹机关于横滨时，其弟“道一与秋瑾女士……本有十人团之组织”。<sup>⑪</sup> 王时泽又回忆，当时秋瑾“常到东京麹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去练习射击技术，又学习过制造炸药”。[8] (P. 202)

同期，秋瑾还帮助随《苏报》主人陈范流亡日本的两个妾脱离陈范，谋自主独立。冯自由谓：陈范之“二妾湘芬、信芳均浙籍，系出故家，瑾以其有玷同乡名誉，乃使脱离陈氏范围，并劝同乡学生助以学费。湘芬、信芳因得离陈独立”。又劝谏与她重兴共爱会的陈撷芬拒绝嫁作商人妾之父命。冯自由谓：

陈范之女公子撷芬……忽奉父命将嫁粤商廖翼朋为妾，留学界闻之大哗，瑾乃召集女同学开全体大会，向撷芬严厉警告……瑾曰：逼女作妾即是乱命，事关女同学全体名誉，非取消不可。众鼓掌和之，撷芬靦然退席，婚事遂以瓦解。[9] (P. 165)

此时的秋瑾，在留日学生界尤其是留学女界中已是著名领袖人物。上海的《女子世界》1905年第3期发表署日本东京调查员“外国特别调查”的报道亦称“据最近调查，中国女子在东京者百人许，而其中最著名者共三十人。就中……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sup>[10]</sup> 即在中国传统学问方面，秋瑾亦被视作留学女界之第一人。

1905年冬天，浙江反清运动领袖陶成章、徐锡麟和龚宝铨等先后再去日本，谋入东京军事学校。“锡麟携其妻王氏即名振汉者同来，瑾为之

<sup>⑩</sup>1905年1月到3月，宋教仁在日记中有7次关于秋瑾的记录。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33、36、37、39、48页。

<sup>⑪</sup>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287页。虽然，刘揆一未说明黄兴“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的具体时间，但当年冬天黄兴就返回国内活动是明确的。因此，黄兴“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秋瑾加入练习以及与刘道一等人组成“十人团”的具体时间，应该就在9、10月间。

照拂一切。”此时秋瑾又与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和陈伯平共六人结盟于东京本乡区北辰馆。[3](P.61)[11]之前秋瑾参与的三合会的第二次拜盟和“十人团”、同盟会等均是多省和全国性组织,而此次的结盟却是浙江省内的组织,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等已经在浙江有较长期的反清宣传活动,这是秋瑾以后在浙江活动的重要基础。

### 三 作为实践女学校学生的秋瑾

实践女学校制定的师范速成科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理科、历史、地理、算术、图画、体操、唱歌、日语、汉文等12门课,每周36课时。<sup>⑮</sup>秋瑾在致誉章函内亦称:“(学校)学规甚紧,每礼拜三十三点工(功)课,又自修六时。”[7](P.42)关于此期秋瑾在学校学习的情况,据坂寄美都子回忆,秋瑾未能像其他女学生一样学习,相比其他学生,她外出更多,但也能够遵守学校的归校时间。<sup>⑯</sup>坂寄美都子之所以强调此点,应该有以下原因。1904年7月16日,下田歌子在为该校首届中国留学生陈彦安和钱丰保举办的毕业典礼上致辞,她特别指出:在最初的8位留学生中,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学几位,最后剩下陈彦安、钱丰保两位坚持到最后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要克服“规则极严需有很大忍耐力的宿舍生活”。在致辞的最后,下田歌子希望两位毕业生归国后成为女子教育、国家和家庭进步的原动力,强调不希望留学生成为“激进的民权论者、乱臣贼子”。<sup>⑰</sup>下田歌子所谓“规则极严需有很大忍耐力的宿舍生活”,可从该校1905年专为“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所制定的《通则》第12项“学生必须遵守的要项”内看出。要项第一条开宗明义宣布:本校是为培养既能够担当中国女子教育之任,又能够胜任一家之主的中国女性为目的,故特别重视陶冶品性。要项以下规定:如平时没有舍监或教师同行不得外出,特殊情况下必须一人外出时,需要保证人出具保证书;没有保证人的证明,不得与访客会面,即便会面也必须在舍监或教师指定的场所进行;除去星期日平时不得外出,如有保证人出具证明被特殊许可外出,次数每周不得超过两次,并且外出前和归来后必须立即向舍监报告;如得到许可外出,外出的时间必须在授课结束之后,返校的时间必须在日落之前;所有授课时间内不得接待访客,等等。其他

还有诸如不得身着华丽奢侈的服装,在学期内必须身着学校的制服,如生病或发生异常情况必须随时报告舍监,听候舍监的指示行事,等等规定。<sup>⑱</sup>

据坂寄美都子对秋瑾的回忆,再对照以上学校“要项”内容,说明秋瑾并未严格遵守学校的管理规则,而且其行动还严重抵触学校所制定的办学目的和校长下田歌子对留学生的期待。如前述,自9月初秋瑾加入同盟会并成为浙江主盟人以来,她广泛活跃地参与多种同盟会和留学生的活动,而且还在学校接待各种访客,甚至连在日本大名鼎鼎的一贯长期支持和参与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家,在孙中山与日本政治家之间充当联络人的宫崎滔天那样神奇的人物,也经常到学校与秋瑾会面,就连坂寄美都子都听到校内有秋瑾“在骏河台有部下三百,<sup>⑲</sup>在上海有部下500”的革命家领袖形象的传言。可以推测,秋瑾的做法势必令她自身和校方都感到困惑,而这个困惑似正是导致她在前一年从学校自动退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述,秋瑾此次入读实践女学校是有条件的,对校方而言是一次破格的做法,因此,秋瑾对自己的活动将会招致的严重后果应该很清楚。

据王时泽回忆,当时秋瑾劝他正在东京的母亲也自费入读实践女学校师范速成科,其母亲入读后与秋瑾同住一室。王时泽说:

(母亲)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好,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我母亲多次谈到,秋瑾在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完功课,人家都已熄灯就寝,她

<sup>⑮</sup>具体课程内容详见《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东京:实践女子学园,1981年,第100页;又大里浩秋《日本人眼中的秋瑾——秋瑾史实的若干再检讨》,中国研究月报,1985年第11期,第14页。此文由大里浩秋教授赠送。

<sup>⑯</sup>坂寄美都子在回忆中还说:秋瑾“自习的时候常常在窗前吟诗;品行很好,比秋瑾更好品行的人再没有了”。大里浩秋《日本人眼中的秋瑾——秋瑾史实的若干再检讨》,第15页。

<sup>⑰</sup>参见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页。关于此次毕业典礼,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拙作《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

<sup>⑱</sup>“速成科规则第十二条”,《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第116、117页。另外,《日本人眼中的秋瑾——秋瑾史实的若干再检讨》亦讨论过此规则,并试图探讨实践女学校规则极严的宿舍管理可能给秋瑾造成的困惑。

<sup>⑲</sup>“骏河台”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会馆所在地。

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待到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床。现在收入《秋瑾集》中的诗词文稿，有许多就是这时期写的。<sup>①</sup>

秋瑾是诗人，好悲歌，赋诗作词时“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的状况可能会有，但是，笔者以为秋瑾的如此状况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sup>②</sup>第一个原因：秋瑾此期的校外活动严重与学校的管理规则相抵触，秋瑾似既感困惑又感事情的严重性。学习师范教育，是她东渡日本留学所公开表示之初衷，但她在留学中所参与的多种活动，又令其在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师范教育的毕业生，还是成为一个反清革命的活动家之间徘徊和矛盾；第二个原因：秋瑾始终苦恼于留学费用匮乏的问题。春天她归国筹学费，最终仅靠母亲“勉筹数百金”。关于在学校的用费，秋瑾曾在致誉章函中称“每月须三十元之谱，尚不敢奢侈一点。”但秋瑾每月的用费开销决不只仅用在学校方面的30元，她在学校之外应该还有很多的开销。如用于参加同盟会、留学生以及同乡会各种活动方面的费用。秋瑾始终在为筹留学费用烦恼和焦虑。如前述她在6月和8月，因其留在湘潭夫家的“珠帽及珠花”和誉章误寄到湘潭王家的银元一百未取回，而痛骂丈夫王廷钧，又痛悔自己的婚姻。另外，从9月12日、10月6日、11月6日、11月28日等秋瑾致兄誉章数函中，均可以看到因为丈夫王廷钧以及湘潭夫家不肯提供或借贷留学费用，而被秋瑾痛骂和轻蔑的内容。正是在这些函中，秋瑾表示要与丈夫和夫家决裂。特别是11月内的两函，可看出为留学费用短绌，秋瑾的烦恼和焦虑愈趋加重。前者谓：“……殊深焦灼也”，后者再谓：“……殊令人焦急万分耳。”11月28日函之最后，秋瑾有似非常心痛的一段话：

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惟妹而居无室家之乐，出无戚友之助，漂泊天涯，他日之结局实不能豫定也。吾哥虽稍胜一筹，而无告语则同，无戚友之助亦同，所幸者，生为男子耳，结局似胜妹十倍也。但妹亦不作杞忧，处今日之世界，国尚如此，况妹乎？惟切齿者，吾之仇，报复无计，实平生隐痛也。惟祈吾哥善筹自立之计。<sup>③</sup>

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各种忧虑和烦恼绞合在一起，正看出秋瑾此时在学生和革命家的身份和活动之间的矛盾。秋瑾将所有的不快发泄于丈夫，所谓“惟切齿者，吾之仇，报复无计，实平生隐痛也”。由此看出，多方设法但仍然筹集不到足够的留学费用，给秋瑾造成的痛苦之深。

#### 四 秋瑾与留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运动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根据清政府强烈要求管理留日学生之对日交涉，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此规则立即招致留学生之强烈反对。留学生最反对的是对住宿之宿舍和公寓进行“取缔”<sup>④</sup>以及不许“性行不良”的学生入学。

12月3日，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召开全体留学生会议，决定各校代表和会馆总干事一同前往公使馆，要求彻底取消取缔规则；12月4日，弘文学校的部分留学生开始集体罢课，并致函其他学校留学生。于是，各校留学生代表“因而亦主张集体罢课”。12月5日，三百名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富士见楼，商议应对取缔规则事。该日的会议决定了今后的方针：自第二日（6日）开始，各学校一起罢课，并以铁腕对付破坏罢课的学生。为此各校成立了纠察队，纠察队“以革命派自费生所组成的敢死会为核心”。[12]（P. 391-392）自此，无论留学生还是留学生中的同盟会员，都分化为两派。如当事人胡汉民说：

宋教仁、胡瑛等主张学生全体退学归国，谓即可从事革命，余与精卫、执信……则反对之，以为此事纵出于最恶之动机，吾人自可运动打消之，退学归国为下策……开学生大会时，两派辩

<sup>①</sup>王时泽回忆中特别注明《秋瑾集》乃1960年中华书局版。见《回忆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第203页。

<sup>②</sup>秋瑾此期如此的状况，类似服部繁子所忆：1904年9月底秋瑾在入读实践女学校一个多月之后，她与繁子会面时说“这一阵子，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活得很长了。灵魂抛弃了我，我只是在鞭打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会活得很长了，我必须鞭打这没有灵魂的躯壳”《回忆秋瑾女士》，《季刊东西交涉》1982年第3号，第48页。王时泽的回忆，可以佐证服部繁子关于此期秋瑾述自己心绪所忆内容，大致无误。

<sup>③</sup>以上函内容，见《秋瑾集》第42、41、43、44页。关于实践女学校的费用，王时泽也有相同的说法。见《回忆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第203页。

<sup>④</sup>所谓“取缔”，在日语中是“管束”、“约束”和“管理”的意思。

争甚烈,不决而散。然各校已次第罢课。

很快,宋教仁的态度发生动摇,而胡瑛仍然坚持退学归国之主张,因此,罢课归国派的学生组织了以胡瑛为主席的各校联合会,<sup>②</sup>主张继续留在日本进行反清宣传运动和完成学业的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则组织了维持会。

秋瑾一开始就站在罢课归国一派,有资料记录了秋瑾在此期的行为和活动。如12月5日,秋瑾作为全体留日女学生的代表,参加富士见楼的集会,在现场的山西留学生监督李宗棠记道:“其时,女学生秋瑾演说,发挥女子爱国心,至痛苦,哭已复演说”;又记述:

秋瑾因此愤而退学。本来实践女学校的学生原定在校内商议解决,却因秋瑾提议联合罢课,前往赴会,实践女校校长下令:“参加联合罢课的人,笈令退学。”秋瑾与同学17人,当时尚未找到住宿之处,亦要马上离开学校的宿舍。<sup>⑤</sup>

12月9日,已从实践女学校“愤而退学”的秋瑾,决定在当月内归国,该日她致誉章一短函,谓“今留学界因取缔规则,俱发义愤,全体归国;此后请勿来函,大约十二月须归来也。”<sup>[7](P.45)</sup>秋瑾在此日决定归国,似与以下事件有关,见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日记:

冬月十四日(12月9日),天晴。湖南同乡会开会,决定全省留日学生,一律退学回国。各省同乡会,日来亦纷纷开会,闻多数与湖南取一致态度。午后,陈北襄来,谓同乡陈君天华,为取缔规则事,愤而投海,遗书数千言,勉励同人,非达到取消取缔规则的目的,决勿留东。闻之深为哀悼……此次凶耗传来,留学界全体为之震动。是晚,弘文代表,持愿书找余书名,余即书愿归,并画押其下。复得使馆消息,公使学□日本文部大臣,交涉取消规则事无效,同学全体,决定退学归国。<sup>⑥</sup>

此日记记录了三件事:一、湖南同乡会在未知陈天华之死消息之前,已决定全省留学生全体归国,此举得到多省同乡会之响应;二、陈天华之死及其遗言,加剧了已经决定要归国留学生之决心;三、中国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交涉取消取

缔规则事之失败,使决定退学归国之学生数增多。陈天华蹈海自杀在12月8日,下午六时尸体被发现,此日深夜,日本警察在查清死者身份之后,通知了留学生会馆。9日凌晨,黄兴等人赶赴陈天华出事处,当日在留学生会馆宣读陈天华之遗书时,黄兴记道:“一人宣读之,听者数百人,皆泣下不能抑。”<sup>[13]</sup>

以上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天,而其中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令秋瑾退学归国。如湖南同乡会议决定全体归国,视自己为一半湖南人之秋瑾,当然不会采取例外之行动;陈天华之死及其遗言,更足令最早实行罢课的秋瑾除退学归国外别无退路;公使交涉取缔规则事失败,决定退学归国的学生数量增多,脾性好强的秋瑾自然不甘落后,此时归国是她唯一的选择。因此,秋瑾12月9日发给誉章之短函,必是在经历了此日以上三件事之后。王时泽回忆亦说:“十二月八日,陈天华愤而蹈海自杀。自陈天华投海后,秋瑾受了很大的刺激,决计立即回国,自谋出路。”<sup>⑦</sup>陈天华之死,成为秋瑾归国的决定性事件。

秋瑾真正离开日本归国,时间是在该月末。<sup>⑧</sup>关于秋瑾在归国前的活动,从几则资料可以了解。如陶成章之忆:“取缔规则风潮起于学界,学生咸倡归国之议,瑾亦主张之,因结敢死队,瑾又为其指挥,纷扰者匝月。”<sup>[3](P.61)</sup>非当事人而在北京的服部繁子,据有关当时秋瑾之传闻回忆:

有不少人来信告述我,秋瑾批评日本的女子教育,特别是对下田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痛斥实践女学校的教师们。当时她站在水道桥的路旁讲演,批评日本对留学生的教育,引发一场骚乱,最后惊动了警察。<sup>[5](P.49)</sup>

同样是非当事人的周作人,大约后来从鲁迅和许

<sup>②</sup>胡瑛(1884—1933),字经武,湖南桃源县人,华兴会和同盟会会员。

<sup>⑤</sup>以上内容和引言参见和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381、377、378、384、386、389页。

<sup>⑥</sup>转引自《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93页。

<sup>⑦</sup>《回忆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第204页。陶成章亦谓“湖南陈天华蹈海死,瑾亦从此逝矣”《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61页。

<sup>⑧</sup>秋瑾在东京致誉章最后一函,署日期为“12月22日”。而留日学生最早归国的一艘船出发于12月13日,16日又有一艘船出发,以后又不断有乘坐大批归国留学生的船只出发。参见《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98页。

寿裳等人那里得到关于秋瑾之传闻，其回忆：

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sup>②</sup>

总之，在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中，秋瑾采用了比较激烈的行为，在全体留学生中都比较突出，因而还引发日本媒体的关注。如12月17日，东京的《国民新闻》在以“清国学生纷扰汇报”为题的文章中谈及秋瑾：

清国学生的领头人中，有一位叫“秀锦”的女学生……她不仅姿色动人，善辩之口才也不让须眉男子。作为此次纷扰事件之带头人，其东奔西走，游说于同学之间，激励学生之意气。据说其麾下集有七、八百人，供其指挥。

20日东京《每日新闻》在以“清国女生之态度”为题的报道中，亦谈及秋瑾“如秋瑾者，被视为女留学生中之秀才，她在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设立了白话会，让女学生们进行演说。此次事件，秋瑾最先加盟。”<sup>③</sup>

秋瑾的事情也传到上海，同月17日上海的《时报》报道：

（留日学生）开会于富士见楼……会中女学生演说，发挥女子爱国心至痛哭，哭已，复演说其出校之事，原实践女学校学生本住校内，秋瑾提议罢课赴会，校长语以罢课即须出校，彼时，秋瑾同学等十七人皆未有住处，而仍出校。

27日上海的《中外日报》亦报道：

（实践女学校）该分校本有中国学生二十名……该校最先退学者为秋□，彼为女留学生之俊秀，常在留学生会馆中演说，此次事起，彼首倡议退学，人皆称为女丈夫云。<sup>④</sup>

而据日本学者大里浩秋的研究，事实上，当时实践女学校中国留学生分部在读的学生只有17名，她们都参加了留学生的联合罢课，但最后仅有包括秋瑾在内的3名学生退学而搬离学校宿舍，其他的学生虽然一度处于停课的状态，但仍然住在学校宿舍，以后复课。[6]（PP. 16-17）无论如何，秋

瑾都被事件之内外者视作此次反对取缔规则运动激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当留学生开始逐步退学归国后，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就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说服留学生不要冲动退学归国，而继续留下来完成学业。于是，主张退学归国的联合会就与继续坚持留学的维持会“展开笔战和宣传战，双方陆续发表意见和声明，展开激烈的笔战，声明中更充满了火药气味”，“两派的人，互相倾轧，纠缠不清”。[12]（P. 402）胡汉民回忆彼时秋瑾之行为：

方联合会势最张时，竟宣布余与精卫之死罪于全体留学生俱乐部。女同志秋瑾尤激烈。范源濂避匿病院，亦为所殴击。一日，秋偕各省分部部长要约余与精卫谈话……精卫辞不往，余独见秋等，具言为本党立场，故吾人当置重革命之利益，其他非所计。秋与诸人皆折服，乃言当在党中更为一致之决议，庶不致因此而生分裂。余亦甚然其说。

秋瑾与胡汉民等人召开同盟会会议之结果，是后者的主张获得通过，并要同盟会会员胡瑛解散主张全体留学生罢课归国的联合会。[14]（PP. 20-21）

秋瑾既然主张由同盟会开会决议是否会员的留学生们退学归国，而同盟会会议又否决了退学归国之主张，但是最终秋瑾还是于12月末归国。关于同盟会会议否决了退学归国之主张后秋瑾之情况，据参与罢课而决定继续留在日本求学的景梅九之回忆：

记得有一天开会，议和平了结办法，鉴湖女侠便道“中国人办事总是虎头蛇尾，从此后，不和留学生共事了！”大家听这几句讽刺话，有些感动……鉴湖女侠总是不同，便负气回国去了。[15]（PP. 243-244）

据反对取缔规则运动当事人之回忆，及后来

<sup>②</sup>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如王时泽回忆“有个浙江留学生胡道南，因谈论排满革命与男女平权问题，彼此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秋瑾当面骂他是‘死人’。”见《回忆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第202页。周作人此处的回忆应该不误。

<sup>③</sup>以上两则资料，转引自大里浩秋《日本人眼中的秋瑾——秋瑾史实的若干再检讨》，第17页，文章注明“秀锦与秋瑾之发音相同。”

<sup>④</sup>以上两份报纸两则报道的线索，笔者首先从郭长海、李亚彬编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秋瑾事迹研究》中获知，特此说明。

学者的研究,当时退学归国派大多数是自费生,即将完成学业而又学有专门的学生及官费生则退学归国者少。[14](P.21) [15](P.243) [12](P.382) 宋教仁在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之初,是主张退学归国派,但很快立场动摇,不再坚持原来主张,不知是否与其在该年夏天已经转为湖南省官费生资格有关?

综上所述,秋瑾于1905年8月再度入读实践女学校后,她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校外的活动——同盟会、留学生和同乡会的各种活动,她的行为与实践女学校严厉的校规发生严重抵触,再加上留学经费愈趋匮乏,她的情绪和心理亦愈加痛苦和焦虑。因此,再度从实践女学校退学,对秋瑾而言是时间早晚的事。激烈地参与留学生反对日本文部省的取缔规则运动,而最终被学校“飭令退学”,或许也是秋瑾预料中事吧。

#### 参考文献:

[1]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 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M]. 东京:实践女子学园,1981.

- [2]易惠莉. 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子学校之原因[J]. 社会科学,2012(2).
- [3]陶成章. 浙案纪略·秋瑾传[G]//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4]宋教仁. 宋教仁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5]服部繁子. 回忆秋瑾女士[J]. 季刊东西交涉(东京),1982,(3).
- [6]大里浩秋. 日本人眼中的秋瑾——若干有关秋瑾史实的再检讨[J]. 中国研究月报(东京),1985(11).
- [7]秋瑾. 秋瑾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8]王时泽. 回忆秋瑾[G]//郭延礼. 秋瑾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 [9]冯自由. 鉴湖女侠秋瑾[M]//革命逸史(第二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0]秋瑾留日活动纪事五则[G]//郭延礼. 秋瑾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57-58.
- [11]王时泽. 秋女烈士瑾略传[G]//郭延礼. 秋瑾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89.
- [12]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北京:三联书店,1983.
- [13]曹亚伯. 陈天华投海[G]//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14]胡汉民. 胡汉民自传[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
- [15]景梅九. 罪案(节录)[G]//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 On the Reason of Qiu Jin's Admittance and Withdrawal from Tokyo Practice Girls' School in 1905

YI Hui-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late March 1905, Qiu Jin returned China from Japan, and travelled to Tokyo again in late July to be registered into Practice Girls' School as a craft crash course student of female norm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school forced her to drop out of school after four months of her enrollment in December.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reason why Qiu Jin decided to be admitted to Practice Girls' School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urpose of returning China to raise tuit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fter her joi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the protest against Banned Rules Movement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is way,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Qiu Jin's short-term studying-abroad experience is to be obtained. Meanwhile,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us to understand her glorious death as a martyr in less than two years after her withdrawal of the school.

*Key words:* Qiu Jin; study abroad; Japanese

(责任编辑:吴芳)